

1978—

—1988

陕西 文艺 十年

陕西人民出版社



941

88/3



290
陕西文艺十年

1978—1988

王 愚 肖云儒 编
权海帆 陈孝英 贺志强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插页 166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

ISBN 7-224-01006-5 / I·222

定价：3.10元

序

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 牟玲生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的到来，陕西的文学艺术事业同全国一样，在十年浩劫的废墟中复苏，沐浴着党关于文艺的正确路线方针的阳光，呼吸着创作自由的清新空气，顽强跋涉，开拓奋进，已经走过了将近十年的路程。

在这十年之中，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没有辜负在改革开放中昂扬奋进的大好年华，没有辜负党所创造的融洽舒畅的艺术环境，没有辜负三秦父老兄弟对自己的诚切的期待和热望。他们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二为”方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满怀对艺术的真诚，把艺术触角深入于除旧布新、革故鼎新的历史涌浪之中，深入于改革大潮中各阶层人们的心底，倾听时代的足音，感受时代的情绪，孜孜不倦地进行艺术耕耘。在创作实践中，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不断开拓艺术思维，变革艺术观念，吸收国外文学艺术的积极营养，执着地追求着不失自己艺术个性的突破和超越。一樽樽艺术美酒——门类各别、体裁相异、题材多样、风格独特的文学艺术作品，就这样在他们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攻方格”拼搏中问世。我们的文艺理论家、评论家也没有愧对时代、愧对人民、愧对神圣的文学艺术事业。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热情地为佳作叫好，为初入文坛的新

人鼓劲，为创作的每一突破击节赞许，并竭力高瞻远瞩，探幽发微，窥视方向，洞察规律，力求对我们的文学艺术的每一成就和突破给予科学的、或高屋建瓴式的、或抽丝剥茧式的理论总结。正是作家、艺术家和理论家、评论家的默契配合，使三秦的文艺园地展现出花团锦簇、争奇斗妍的景象。

在新时期的陕西文艺园地中，文学、电影、戏剧、美术、电视剧、音乐、舞蹈等门类泛光流彩的成果，令人流连忘返。在文学方面，十六篇（首、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诗歌、儿童文学、报告文学作品在全国作协举办的历届评奖中获奖，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则远越重洋，获得国际性的美国美孚公司“飞马”文学奖。不仅使人们对三秦黄土地上的作家们刮目相看，也为中国文学争得了荣耀。群众性最强的电影艺术的成就是令人感叹的。几乎家喻户晓：西安电影制片厂相继拍摄了《生活的颤音》、《第十个弹孔》、《西安事变》、《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野山》、《黑炮事件》、《老井》、《红高粱》、《最后的疯狂》等优秀影片，获得文化部、广播影视部优秀故事片奖、“金鸡奖”或“百花奖”。《老井》、《红高粱》则分别跨越国门，前者获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大奖，后者获第三十八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在戏剧方面，秦腔《西安事变》、话剧《西安事变》、歌舞剧《兰花花》、秦腔《白龙口》、话剧《唐太宗与魏征》、歌剧《波丽扎特》、儿童歌舞剧《月儿皎皎》、商洛花鼓戏《六斤县长》等剧目，都在人们心坎上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并获得有关方面的奖励。特别是振兴秦腔的苦心经营，以《千古一帝》、《卓文君》、《杨贵妃》等剧目的问世而令一些不看、怕看、厌看秦腔的观众

开始对秦腔产生了兴趣。在美术方面，1984年以来的几届全国美展中，《入蜀图》、《绿，来自你的手中》、《信息——人类智慧的契机》、《大唐伎乐图》、《同欢共庆》等作品获五块金牌，显示了长安画派的艺术潜力。电视剧，这个艺术家族中的小兄弟，在我省从80年代之初迈开生命历程的第一步，短短八九年，就有一百三十多部（集）艺术骄子在荧屏上与广大观众见面。其中，《喜鹊泪》、《在古师傅的小店里》、《希波克拉底誓言》、《独脚冠军》等获得了“金鹰奖”或“飞天奖”。音乐、歌舞方面的收获也令人十分可喜，恕不在此一一列举获奖作品。必须一提的是，《仿唐乐舞》、《唐·长安乐舞》曾传诵一时，至今久演不衰……

在新时期的陕西文艺园地中，文艺理论批评的成果和发展势头也令人为之振奋。不断壮大的理论批评队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方法论，以小说理论的研究和创作实际的评论为自己的主要课题，发表了许多颇有识见的文章。喜剧美学的研究拔地而起，很快受到全国美学界、艺术理论界的重视，使陕西一时成为全国喜剧美学研究的中心之一。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也自成一“派”而立。西部文艺的研究打开了一块新的理论天地。延安时期的文艺研究则在艰难中顽强地开掘着、奋进着……

的确，新时期的陕西文学艺术园地是繁花锦簇、斑斓璀璨的。面对这样的艺术园地，谁能准确地、没有遗漏地点出那些绚丽夺目的花朵的名字呢？挂一漏万，势所难免。尽管如此，已足可证明陕西文艺的十年，是成就辉煌的十年，是可堪赞叹的十年。

前不久，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这是一个对于我国文艺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纲领性文件。伴随着这个文件的贯彻落实，我们的文艺事业将方向更明，路子更正，并具有更良好的社会环境。再加上，新时期十年为我们陕西文艺事业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忠于时代、忠于人民、忠于艺术事业的富有才华和创造力的作家艺术家，并为他们在创作上的更大拓展积蓄了“底气”和潜力。陕西文艺的未来，必是在新的层次上走向新的超越、新的繁荣的未来！

正是出于对新时期陕西文艺总体面貌的这种宏观认识，为了准确地、科学地概括和总结在这十年中陕西文学艺术各个门类的成就与不足、所长与所短、所得与所失、优势与劣势，以利于今后的自我突破和超越，也为了进一步培养和提高我省的文艺理论批评队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组织省文联、作协陕西分会、省艺术研究所、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开展了“新时期陕西文学艺术成就研究”活动。活动开展以来，专业、业余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积极响应，纷纷挥笔撰文。这本《陕西文艺十年》收入的论文，就是从他们所撰写的数十篇论文中精选出来的。这些论文，都具有较高的艺术辨识力和理论概括力，不乏闪耀着智慧的思想火花和精辟的学术见解，可堪一读。相信读者会开卷有益，从对我省文学艺术成就的宏观了解中获得对时代的深刻认识，获得在改革开放中前进的精神动力；而文学艺术工作者则会从中锐化自己的审美目力，开扩自己的艺术思维，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增进自己的艺术勇气，甚或从中寻找到在艺术上突破和超越的启示。

《陕西文艺十年》，这是我省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献给
国庆四十周年的一份厚礼！——这个评价也许并不过分吧。

目 录

序.....	牟玲生 (1)
气度恢宏与意境深邃	
——从陕西1987年长篇小说谈起.....	王 愚 (1)
审视：陕西部分小说作家的文化心理.....	李 星 (15)
散文美的新拓展	
——新时期陕西散文一瞥.....	邢小利 (34)
陕西十年新诗浅识.....	田 奇 (47)
突破沉寂后的勃起	
——新时期陕西报告文学漫评.....	侯星明 (59)
多姿多彩 俗而不俗	
——蓬勃发展中的三秦通俗文艺谈.....	贺志乾 (72)
西影十年三级跳.....	肖云儒 柴效锋 (83)
两个背景下的陕西戏剧.....	杨 忠 (102)
论陕西戏剧“频道”的动变.....	刘敬贤 (113)
传统与新潮	
——新时期陕西戏剧文学一瞥.....	田润菁 (120)
在焦灼与惶急中跋涉	
——陕西电视剧艺术十年.....	权海帆 (130)
突起的异军 突破的前夜	

——新时期陕西喜剧创作面面观	陈孝英 (144)
民族化与现代化相生相胜的美术新潮	安 琪 (159)
论陕西传统音乐之兴衰	李世斌 (175)
新时期陕西文艺理论批评概观	陈 晨 (189)
尚待深入开掘的文艺富矿	
——延安文艺与延安文艺研究评述	贺志强 (210)
浮躁氛围中的尴尬角色	
——艺术理论研究的时代困惑和现实思考	
.....	王幼贝 (224)
后记	(239)

气度恢宏与意境深邃

——从陕西1987年长篇小说谈起

王 愚

在1987年，或者更准确一点讲，从1986年底，新时期文学度过了步履蹒跚，然而也充满了自信的十年，开始感到了选择的困惑，尽管当时也出现了许多探索、试验的作品，不少作家，不仅写作品，也发宣言，而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已经很难取得前十年某些作品那样的轰动效应。

但是，有一点却引人瞩目，就是长篇小说的大量涌现。对这种现象，不少人，至少是评论界，做过许多分析和阐释，毁誉之间也颇不一致，似乎至今也还没有得出一些令人信服的论断。不过，也应该注意到，长篇小说在1986年底到1987年的涌现，并非是作家们的心血来潮，也不一定是某种浅近的功利目的，而是有着较为深刻的文化背景。这从已经引起极大反响的几部长篇小说中，可以大致看出一点眉目来。且不说象《活动变人形》这样的作品，从较广阔的文化现象入手，写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命运沉浮。即使象《古船》、《浮躁》这样的作品，它们都是着力于开掘一个地区、一个乡镇各色人等的心灵变化和人生道路，而这种变化，却都是变革时期所触发的历史与现实、封闭与开放、传统与当代之间的心理冲撞。另外一部出现在1986年，

却在1987年直至1988年才完成的《平凡的世界》，虽然意在揭示农村改革起步带来的变化，但着眼点仍是孕育在“文革”后期的那股人心思变的潮头。所以作品选择的背景是1975年到1985年这一段时间。也可以说，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经历过一场翻天覆地的浩劫摆脱了长期套在自己身上的各种羁绊（物质的、精神的），睁开了眼睛，清醒了头脑，一方面对自身的过去不能不严肃地进行反思，一方面对自身的未来不能不充满着憧憬，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处在一种非变不可，却又难以改变的两难境地，单纯地谴责过去，简单地讴歌变化，甚至天真地向往未来，似乎都难以平衡自己的心态，难以承受纷纭的现实，这或者可以看作是当代人们的普遍心态，也就给作家们留下了可以驰骋的创作天地，留下了可以上下求索的思维空间。如果对长篇的大量涌现，排除掉那些个别的，或者非文学的因素，这种共同的文化背景，应当看作是长篇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全国如此，陕西也不例外。前几年，陕西的文学界曾不止一次谈到过新时期本地区长篇小说创作的空白，但情况一直改变不大，直到1985年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奖，陕西还是拿不出一部长篇。具体出成果还是1986年底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1987年一开始，贾平凹的《浮躁》发表，随后就出现了一批长篇小说。根据远非完全的统计，1987年，有13位作家发表和出版了16部长篇小说，还有一些长篇小说即将出版。这些小说，不仅出自一些已经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和显示了一定创作实绩的作家，象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邹志安以及李天芳、王蓬、赵宇共、赵熙、任士增等；也有一些是出自过去还不太为人所知的作家，象文兰、

马建勋、魏雅平等；这中间也包括以写历史题材为主的作家，象冰昆等。由于长篇的阅读，工作量甚大，很难求全，随手举出这些，已经是林林总总，蔚然成风，足见长篇小说创作的集中涌现，确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一种文化现象。

自然，简单从数量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对文学来讲，恐怕尤其是这样。然而，“文变染乎世情”，文体的变化和兴衰，常常是一个时代、一定时期文化氛围的体现，这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单就建国以来文学的发展看，几部产生过较大反响的，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长篇，大部分产生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也就是建国后的第一个十年。而新时期文学中的长篇小说涌现，也都在1986、1987年左右，恰恰又是一个十年。这中间原因可能很多，也不排除文坛上经常会有的赶浪头、追时髦的弊病，但一个时期的文学，经过十年途程，积累了经验，体味了人生，研究了社会，反思了历史，从作家对现实的渗入和作家自身的含茹看，一定会有不少披沙拣金、探幽索微的体验，广采博收、丰富充盈的积累，要以较大的包容量和较强的穿透力来表现这一切，恐怕必然要考虑到长篇小说这种文体。

如果从这样一个背景来考察长篇小说的大量涌现，那就应该承认，尽管许许多多长篇小说不成熟，或者说艺术的功力还欠一点火候，但这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仍然标志着文学开始走向成熟，开始走向一种较为自觉的创作心态，无论怎样，写作长篇总需要更丰富的艺术经验，更深厚的人生体验，更高一点的透视历史和现实的眼力。

这是从一定时期的文化现象的角度来看长篇小说的涌

现。具体到每部作品，当然会有差别，会有高下。不过，那也会从不足的一面，更显现出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的长篇小说应该具有的智慧风貌和艺术高度。这也可以看作我们分析的起点。

就陕西1987年出现的为数不少的长篇小说看，题材的拓展是相当明显的。尽管不少长篇小说仍然是以表现农村生活为主，但展开的生活网络，早已不再局限于辛勤劳动、自给自足的生态。象《平凡的世界》既触及到农村一家一户，也牵涉到区、乡、县、地；既有务农，也有做工；既有乡镇，也有煤矿，总之，是以农村为轴心的一个辐射网，显示了当代生活的互补与互渗。《浮躁》以州河为基点，但搅动那个小镇生活和人们心态的，是来自大时代的冲击波，务农与经商，权力与金钱，文明与封闭，宗族与改革，几乎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涌动着一股躁动不安、变动不居的气氛。其他象《眼角眉梢都是恨》等爱情探索系列小说，以展现当代农民性爱心理为指归；《山祭》、《太阳之恋》一写山民生活，一写知青遭遇，但都把十年浩劫作为背景，尽力写人生命运的沉浮，表现作者对人世沧桑的体味，而新近出版的《月亮的环形山》，写一群山区中学教师的升降沉浮、悲欢离合，特别是其中对这样一些小知识分子的命运坎坷、感情交流、心理衍变的细腻剖析，折射出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的推移，不仅在陕西，在全国的长篇小说中，也是颇具特色的。这一切都可以看出，作家们对现实生活的把握，已经不是零星的感受和表象的描摹，而是从时代的整体出发，破除了过去以题材论成败的模式。还有不少表现历史生活题材的小说，不仅写人所共知的历史事件，而能独辟蹊径，步入

一些过去从未涉足的领域，象写林则徐流放新疆生活的《国魂》*、写陕西辛亥革命的《血雾》，以及写长征中红四方面军覆没的《死亡的醒悟》，都是作者经过苦心搜求并反复融汇了的历史生活，未必可以当信史看，但却不能不说是作者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精心选择的结果。

自然，题材的拓展只能说作家们向文学的自觉靠拢了一大步，不再象过去那样把题材的意义看得过重，甚至把题材本身当作文学的根本追求，确立了整体把握生活的美学追求。但这还不能说明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思想内涵。长篇小说要求有较大的包容量，但这个量绝不意味着生活现象的罗列，更不是奇闻轶事的堆砌。这个包容量主要应该是作品展现的生活场景能否体现一个历史阶段的特色，是作家对现实的体验能否触及时代文化心理的内在机制。概乎其言，就是作家在作品里构建的生活空间思维空间，能否引起读者对历史整体和人生整体的内蕴有新的发现、新的认知和新的体验，这种意蕴越恢宏、越深邃，作品的思想内涵越深厚，作品的艺术魅力越强烈，对于长篇小说，尤其如此。从这个角度看，陕西1987年的长篇小说，确有不少值得称道之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时，因为是作者积数年之劳，无暇旁骛的精心之作，人们期望较高，但统观全篇，似乎很少出奇制胜的结构，汪洋恣肆的笔墨，只是在那里不动声色的叙述一件件、一个个普通农家所经历的普通生活，在那里剖陈本色的农民心中的隐曲，不免有些不够满足。但是，仔细玩味，认真爬搜，作者把这一切生活的流程和入心的变化，放在“文革”后期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背景下，揭示了沉默的土地上那并不平静的潜流，那不甘于贫困、愚

昧重压的猎猎欲动的变革心态，甚至单纯一个打枣的劳动场面中也蕴含着生命热情，畸型的夺水事件竟触发了生机活力，这都显示着在这块普通的黄土地上将会卷起的风暴。果然，在第二部、第三部，最老实的农民也懂得了从精耕细作以外去开创事业；有抱负的青年干脆离乡背井去自讨苦吃，以求得自身价值的确立，尽管他们在爱情追求上，在生活方式上还保留着不少传统的烙印，但在人生旅途上，开始迈出了新的一步。有人以为，在《平凡的世界》里，看不到对旧有习惯的彻底决裂，看不到人物头脑里当代意识的萌发，但是，《平凡的世界》写的是祖祖辈辈在黄土地上休养生息的普通农民，是很长一个阶段缺少文化，缺少知识，和现代文明相距甚远的穷乡僻壤，他们能够冲破旧有的樊篱，他们能够自己选择应走的道路，他们中间维护旧传统、旧习惯的强者从受人尊敬的位置上衰落下去，敢于创新路的普通农家子弟开始主宰自身的命运，这就是从具体情境出发，透视历史性变革在时代生活中激发起的深层变化，既是对历史变化的追踪，又是对实际的人生的体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的心路历程，而不仅仅是以人为载体的某些现代观念的演绎。据说，《平凡的世界》在中央广播电台连续播出以后，收到不少大学生的来信，反映相当强烈，很可能就是这种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民心路变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读者在读文学作品时，是要体味人生、触动感情，而不是单纯接受一些观念，即使是最先进，最时髦的，最现代的观念，这也许是一个常识问题，但在目前却常常被一些“先锋”作家所遗忘或不屑一顾。从贾平凹的《浮躁》中，也可以看到，作者是从具体的世相情态写起，开掘的却是改

革大潮激起的宗族纠结和人情网络的急速运转，是力图变革与稳压心态的撞击和衍变，尽管作者用来解释这种复杂态势的哲学概括，未必准确，有些还很难自圆其说（象考察人的游离于本文之外的议论、和尚的并没有多少针对性的禅机妙语，多少给人以生硬的、炫耀的感觉），但作者的思维空间已远远不是州河所能范围、不是组成水上运输队和开发公司所能局限，而是通过历史深层的积淀和社会心理的波动，展现急剧变革时代农民冲决旧规而又举步维艰的命运沉浮。还有象邹志安的爱情心理系列小说，就已发表的三部来看，水平并不完全一致，但作者不仅仅局限在农村青年男婚女嫁的一般变化中，而是用当代人的眼光去扫描时代变化给农民心理带来的冲撞和变化，特别是给农村青年妇女带来的心理倾斜与调整，实际上，也是从一个侧面对长期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开始裂变与重新组合的探索。即使那些表现“文革”题材，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甚至离现在更远的历史题材的长篇，也都或多或少以较为广阔的思维，超越题材的表面意义，撷探具有广泛意义的人生意蕴。这或者可以说是近年来许多长篇小说共同的审美追求，但陕西的长篇分明渗透着更浓厚的黄土高原和山区乡镇的气氛，历史负荷的沉重、人生途程的苍凉、经受时代撞击后心灵裂变的艰辛，显示着作家们忧患多于激扬、沉郁多于昂扬、务实多于酌奇的心态，自然也使作品更多显示了雄浑的格调。

也正因为作家们处在大时代冲撞下的陕西，在这块历史悠久和地处内陆的环境中，变革热浪不会象东南沿海那样时时掀起排天大潮，但却会引起更强的触动和更深的引爆，过去单纯从政治的角度、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考虑，顶多只能

从表面上看出 先进与落后、革命干劲与安于现状的两极反差。现在从广阔的文化视角来看，不得不考虑这块土地上（绝大多数是耕读传家的农民和农村小知识分子）人们文化心理结构中沉积的历史负荷，以及在变革时代重新组合时所经历的曲折和痛苦。这也许并不仅仅是陕西地区作家的考虑，但却是陕西地区作家最早注意到并且感受较深的层面。以陕西1987年的长篇来看，由于陕西作家对自己生息的这块土地，对这块土地上的最底层的人民，十分熟悉而又心心相印，有时凭直感就能体味到普通人民最隐曲的心理活动，因此他们在自己作品里一旦放开了视野，不再执着于从政治、伦理角度对人们的心理活动加以判断，往往会设身处地感受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貌似憨厚的农民心理中激起的微妙而复杂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象《浮躁》中那些刻意求变而又变革无术的人们身上，他们（包括金狗、雷大空等）在改革大潮中无不想以自己的所作所为闯出一条新路，但依附于小农经济的传统文化意识，在他们周围组成无形的网络，在他们心理中也形成无法超越的路障，于是他们躁动不安，他们备受坎坷，甚至动用为他们不齿的手段去行动。即使在《平凡的世界》中，当孙氏兄弟分道扬镳时，在他们兄弟二人的心理中掀起的波澜，也无妨看作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的差异，孙少安的身上带着更多的农村青年的印记，但他终于不安分于在土地上的劳动，冒着风险烧窑和承包砖厂，对于一个世代把自己的命运和土地死死联结在一起的老实农民来说，这种抉择引发的心理嬗变，确实是来之不易。孙少平走出农村，走进矿山，一步步遨游在知识的领地上，开拓了视野，开阔了心胸，但他没有完全脱掉农村生活给他